

不能不顾历史事实,一厢情愿地认为儒学曾经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能够重新恢复。面对当前的传统文化热,我们更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将重视传统文化、复兴中华民族文化等同于无条件的尊孔读经、文化复古,不能把重视传统文化解读为独尊儒术,“以为儒学经典中句句是真理,是永远不变的天道、常道,落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陷阱”。^① 我们应该清楚,倘若“不彻底清理与批判古老的、主要是反映停滞社会生活的传统,便无所谓发展创新,更谈不到近代化”。^② 而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经学乃至未被政治化、官学化的原始儒学,皆为小农经济社会的产物,其自身固有的弱点和缺陷,业已积淀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对其清理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奏效。

其次,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非本土文化而认定其不属于“中国文化”,更不能因此夸大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认为两者不能共存,以至从根本上敌视和排斥马克思主义基本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否认其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核心和指导地位。在这一点上,刘大年或许可以给予我们一些重要提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它一旦与中国内在根据相结合以后,就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如果说,中国文化的主要部分指两千年来汉文化中的孔子教义、儒家学说,这大概没有好反驳的”,但“中国文化不能只有古代,没有近代。近代中国文化的主要部分是什么?不管人们赞成与否,这样一个事实却无法否认: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占着近代中国文化主导的位置”。^③ 而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是中国文化现阶段的重要发展”^④,是当代中国的“文化主流”,这是“历史的选择”。^⑤

刘大年《论康熙》的学术贡献及对清史研究的启示

成积春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论康熙》是刘大年先生1961年发表的论文,被认为是其在学术界引起激烈争论的三篇重要论文之一。^⑥ 50余年后读来,仍被刘大年先生富于思辨、优美流畅的文笔和逻辑缜密、掷地有声的话语所吸引,也为其历久弥新的观点所震撼,并引发思考:50多年来我们的史学研究真的进步了吗?有没有因为思想和方法的混乱而使我们在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中不仅没有使问题明晰反而更加纷繁复杂、莫衷一是了呢?

一、《论康熙》的主要学术贡献

(一)指出以往对康熙的评价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刘大年先生之前,国内外资产阶级保守派和激进派曾撰写过不少评价康熙的论著。这些论著,

① 陈先达:《既要反对文化虚无,也要防止文化复古》,《北京日报》,2010年9月20日,第18版。

② 刘大年:《评近代经学》,《明清论丛》第1辑,第3页。

③ 刘大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求是》1989年第7期,第13页。

④ 刘大年:《评近代经学》,《明清论丛》第1辑,第112页。

⑤ 刘大年:《说历史的选择》,《求是》1989年第24期,第23—26页。

⑥ 另两篇论文是《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和《回答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分别发表于《历史研究》1961年第5期和《历史教学》1965年第4期。

在主要观点上尖锐对立,很难让读者了解康熙在中国历史上的实际地位。刘大年先生在《论康熙》引言中列举了法国的白晋、英国的白克好司、日本的西本百川等人对康熙的美化,中国的钱穆、萧一山等人对康熙的复古主义倾向的赞美以及同盟会时期资产阶级评论家对康熙“一笔骂倒”式的批判,鲜明地指出:“中国和外国资产阶级作家的评论唱着迥然不同的调子,是由于他们不可能遵循、并且也没有一个客观标准。他们无非是各自按照自己的需要,舞文弄墨,褒贬是非。即使是反满革命派的作者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对封建思想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这在当时是必须的和有进步意义的,但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是远不相合的。”^①刘大年先生认为,“统治阶级中有些人既是剥削阶级的代表者,同时又在客观上起过某些进步的作用,评价这些人就要复杂得多。”^②因此要“正确对待事实,还康熙其人以本来面目”,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拨开资产阶级思想的重重云雾,批判地看待以往的各种评论”。

(二)突破“教条化”藩篱,客观评价康熙以及清前期的历史地位

在初期尝试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进行历史研究中,评价康熙以及清前期历史地位,也不是容易的事情。50多年前,人们普遍认为清政府的统治是“外国”对中国的征服,甚至认为清初的统治破坏了中国社会生产力,阻滞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由此“对康熙统治下的历史地位采取了否定态度,不承认它的进步作用”。这些认识显然带有教条化的倾向。刘大年先生批评了这种观点,指出:“照这样叙述清代前期的历史,并不能让人们正确理解当时国内的阶级斗争和中国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他首先肯定了康熙及其统治,“康熙在国内和对国外的斗争都为中国历史写下了有声有色和值得珍视的篇章。在国内,康熙统治期间,中国形成了一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相当坚强统一的封建国家;封建的经济文化在这个条件下,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顶点”;“对国外,康熙统治期间,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繁盛的国家屹立于亚洲东部,这使正在把触角伸向中国的西方早期殖民势力受到遏制,并且对于亚洲邻近国家抵御西方侵略势力也有其影响”。其次,他批判了那些认为清政府的统治是外国对中国的征服的观点,指出:“把康熙统一全国说成是扩张领土,或对其他民族的征服,那只会符合于资产阶级地方民族主义观点或是容易陷入那种观点的泥坑里……把清政权的统治看做是‘外国’对中国的征服,这并非从阶级分析出发,而是从汉族与非汉族出发,那只会符合于资产阶级大汉族主义观点,或者是容易陷入这种观点的泥坑里。”他总结说:“如何看待康熙统治时期的中国历史地位,实际上也是整个清朝前期的历史地位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结论只能是:第一,康熙的统治促进了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他的进一步统一全国,抵制西方早期殖民势力的斗争,都是富有进步意义的。因此,第二,康熙统治时期和整个清代前期的历史车轮是向前进的,是应当充分肯定的;采取否定态度是与马克思主义不合的陈旧的观念。”刘大年先生在其后来发表的《回答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对历史上剥削阶级里某些人所起的进步作用是可以予以肯定的,因为那些人代表着历史上一定时期的动向,反映着人民群众的活动和要求。马克思主义主张批判地对待历史,而不主张否定历史,我们不应该无批判地肯定历史上的一切,只应该肯定那些有利于人民斗争的东西;同时,我们也不需要否定历史上的一切,只需要否定有害于人民斗争的东西。”^③刘大年先生对康熙历史作用的客观评价正是这一思想方法的体现。

^① 刘大年:《论康熙》,《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第6页。以下引文不注明者皆引自《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论康熙》(第5—21页)。

^② 刘大年:《回答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历史教学》1965年第4期,第12页。

^③ 刘大年:《回答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历史教学》1965年第4期,第12页。

(三)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的、客观的观点

这样的观点在文中俯拾即是。如,针对资本主义关系在清代前期普遍存在的观点,他认为,清前期的“封建经济还处于牢固的统治地位,使那些商品生产和独立手工业还没有能够迅速滋长起资本主义因素,大踏步推动中国社会走向蜕变。换句话说,商品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虽有相当高的水平,封建土地制度和自然经济的势力却更加强大多。封建经济是一株参天老树,资本主义因素则还只是大树复盖下的一棵幼苗。”

对于粉饰“康乾之治”、过高估计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观点,刘大年先生也持批判态度:“道理很简单,康熙为了加强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提高地主阶级的地位,发展封建的经济文化,都只有依靠剥削广大的农民来进行,只有把这些活动建筑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深受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之上。不这样是不可能的。”且进一步指出:“康熙之所以杰出,不在他是否大大减轻了农民遭受的压迫剥削。在封建社会里农民的遭受剥削是难于减轻的。康熙的杰出,是他的剥削压迫农民,不是使社会生产力走向了衰落,而是利用阶级斗争造成的局面,促使社会生产力发展,推动了历史前进,并且在这方面接近了他能够达到的顶点。”

对于康熙为何不能像同时期俄国彼得大帝一样,为中国进入近代国家多少做出一点贡献的疑问,刘大年先生回答说,一是因为中国距欧洲遥远,康熙没有较多地与西方进步的国家接触,这当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关键还在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即在于当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或适合的状况,在于这种状况造成的阶级斗争形势”,而与“个人的才能性格”无关。进而表达如下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个人的才能性格只有在当时当地社会关系容许的范围里才成为社会发展的活动力量,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能成为社会发展的活动力量。正是依照这个观点,我们说康熙这位封建君主,是在历史前进中起了正面作用的历史人物。”

有人以为是所谓闭关政策妨碍了中国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刘大年先生批驳那是“想当然的说法”,不是有外国来的人就能带来先进的思想和技术。“康熙以后的传教士没有带来更多的东西,特别是没有带来当时自然科学方面进步的科学思想。哥白尼、布鲁诺、培根、伽利略、开普勒、维哈等人的著作传教士都拒绝介绍或很少介绍”,他们讲的是由经院哲学支配的东西,其目的是为神学服务的。

(四)辩证分析当时的主流观点,指出了其中的缺陷和逻辑错误

新中国成立后,一切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都是正义斗争的观点得到了更多的强调和重视,由此产生的一个疑问是,如果肯定反对满洲贵族的民族压迫是正义的,那么如何去评价带有一定满洲贵族特权统治色彩的清朝前期统治?刘大年先生做了辩证、客观的分析:“满洲贵族在全国建立起统治特权的过程也是以暴力实行民族压迫的过程。反对这种压迫的斗争是必要的和正当的。但是清政权在全国的统治既经确立,满族与国内其他各民族的壁垒,首先是汉族与满族的壁垒便趋向瓦解,直至彼此融合,这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更深刻、更长远的影响。必须承认这是康熙和清代前期的统治一项重要的贡献。”在这里,刘大年先生既肯定了清初反抗民族压迫斗争的正当性,又强调在全国统治确立后康熙瓦解满汉壁垒以促使彼此融合的努力是对中国历史的一项重要贡献。

对于清朝“闭关自守”问题,多数观点认为,闭关锁国导致了清朝落后和鸦片战争中的被动挨打。对此,刘大年先生也做了辩证的分析:“对外闭关如果是指清朝的统治使中国照旧保持封建经济的落后状态,孤立于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世界之外,当然事实就是如此。但通常讲闭关自守,主要是指清政府对西方采取了排斥的态度,是一种指责。其实正是这一点上它具有积极的意义。”还指出,“康熙的对外斗争具有反殖民主义性质”,一个统一繁盛的中国使西方早期殖民势力受到遏制,延缓了对中国和亚洲邻近国家的侵略。这些看法表明了刘大年先生对康熙研究的深邃和独到。

的确,康熙的国家安全意识是十分强烈的,也在海防方面做了他力所能及的布控,尽管以前的人们较少注意到或者有意忽略了这一点。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在讨论海防问题时,康熙对大学士、九卿等发出了如此警告:“即如海防,乃当今之要务……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①康熙何其远见!真是一语成谶,百年后的事实证明了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只不过令康熙想不到的是灾难来得如此之快!

二、《论康熙》对清史研究的启示

(一) 追求真理,冷静思考,客观评判清朝历史地位和清史中的重大问题

刘大年先生的《论康熙》是在大量研究基础上,经过宏大史观的理论思辨与探微索隐的冷静思考而形成的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典范之作。此前对康熙及清朝前期统治的评价,不仅有国外、旧史家复古倾向的赞美,也有同盟会时期资产阶级对康熙的“一笔骂倒”,更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所表达的清军入关及随后发生的260余年的清朝统治是一场异族统治中华的灾难的基本观点,郭老的观点及其政治学术地位使这个问题的讨论变得更加困难。更为严重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苏联历史学家齐赫文斯基为首的一些人把清朝看作是外族入侵后建立的统治,而在此之前的半个多世纪里,日本学者也曾持有该论断。应当说,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日本学者还是苏联学者,强调清朝是外族入侵建立的政权都有其险恶目的,是为其本国侵略东北或重新划定边界以及解决领土纷争制造舆论,作为新中国的历史学家必须就清朝统治的性质、地位以及正统性做出明确回答,再也不能如同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因盲目反满排满而使自己在边疆、领土、民族等方面陷于被动,甚至给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正因为此,刘大年先生才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辩证分析了康熙及其所处时代,得出了辩证、客观的结论。

刘大年先生撰写该文时正处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比较严重的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片面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对历史上的帝王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的作用不能给以客观评价,在这种人物评价“一边倒”的声浪中能够站出来历史地、客观地评价康熙和清前期的统治实在难能可贵。刘大年先生对康熙和清前期统治的评价至今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新清史”的代表“从满族人的视角写满族人的历史”,实则是依照过去日本学者的理路来研究清朝历史,得出的结论自然会偏离中国的大历史观,使问题走向另一面,这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有学者过高地估价了当时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萌芽所达到的程度,用“世界的眼光”、比较的方法“发现了”西方在同时期所达到的社会发展水平和中国在同时期所失掉的发展机会,认为康雍乾时期正是使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关键时期,把鸦片战争后中国遭受列强欺凌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康雍乾诸帝没有发展资本主义。事实上,康熙本人是那个时代最为开放、对科学技术最为敏锐的仅有的几个人之一,但正如刘大年先生所说,康熙能否发挥应有的活动力量是由历史所提供的客观环境决定的,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没有为康熙王朝向资本主义变革提供推动力或提出客观要求。同时,保守落后的罗马教廷在康熙时期通过“中国礼仪之争”展现给清廷的是愚昧无知和对中国文化的傲慢无礼,再加上由于信息传达手段的落后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无法使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像沙俄彼得大帝一样为“中国进入近代化国家多少做一点贡献”,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中俄的地缘差异等因素所决定的。

^① 《清实录》第6册第270卷,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50页。

(二)辩证地看待清初的人物和事实,是刘大年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历史评价问题的典范

例如,正面评价康熙和清朝前期的统治,是否意味着要否定反满的民族斗争?刘大年先生这样回答这个问题:“事情并不是这样的逻辑关系:肯定了康熙的统治和清代前期的历史地位,就应当一律否定清代历史上的反满运动;或者是相反,反满运动既有革命性,康熙的统治、清代前期的历史就是倒退的,应一概否定之。”这一辩证看待历史人物、客观评价历史的方法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今学界普遍已不再敌视或贬低清朝统治,相反,有时又过高地评价清朝统一中国的作用,过高地估计和赞美“康乾盛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因为认定清统一中国是历史必然,便对一切抗击清军的民族反抗斗争持否定态度,认为像史可法这样的抗清者是逆历史潮流的不识时务者,而对洪承畴、吴三桂这样的“顺应了历史潮流”的“识时务者”大加赞赏。如此臧否人物,既不是辩证地看问题,也不是历史地看问题,相比50多年以前刘大年先生的人物评价思想方法,显得肤浅得多。

刘大年先生对于清朝“闭关自守”的分析,今天读来仍耐人寻味。纵观人类发展和世界发展的历史,在强盗面前,任何文明、善良和爱好和平的人们都是弱者,在来势汹汹的殖民势力面前,一切文明古国和非殖民主义国家皆有沦为殖民地的危险。因而,不能因为在19世纪遭受了列强的欺凌就认定自己的社会政治、生产关系、思想文化一概落后于西方。事实上,近100多年来,一部分中国人曾经走入“反传统”的误区,全盘否定中华传统文化,未能依照马克思主义扬弃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传承和创新民族文化。今天,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文化多元背景下,更应当辩证分析和深刻反思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社会、制度、国策、思潮、文化,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之路提供更坚实的理论依据。

刘大年与学术组织工作

赵庆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刘大年先生学术事业的根基无疑在中国科学院(1977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他与近代史所颇有渊源。近代史所承接延安史学机构之脉络,并直接以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为班底。^①刘大年1947年任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副主任,1948年任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副主任,为范文澜所倚重,1950年3月20日已被内定为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②但他此时因病休养,副所长职未正式宣布。

中科院建院之初,党员学者极为匮乏,刘大年乃被委以重任。1951年冬开始工作,先后任中科院党支部副书记、中科院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党组副书记,为中科院思想改造的实际领导者。^③

^① 1949年以前中共史学研究机构的传承脉络:1938年5月5日成立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1941年9月更名为中央研究院中国历史研究室——1947年8月北方大学成立历史研究室——1948年8月成为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此4个研究室一脉相承,机构设置以范文澜为依归。

^② 《竺可桢全集》第12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页。

^③ 刘大年:《自传》(1956年1月25日);王德禄、尉红宁:《关于思想改造运动——刘大年先生访谈录》,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编:《院史资料与研究》1992年第1期,第28页。